

追寻学术人生之美

——记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宋协娜教授

□ 鲁晓轩



宋协娜，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山东省齐鲁文化名家，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入选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主要研究主体关系、政党建设规律、社会问题化解。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入选国家社科优秀成果文库1项，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1项。

一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全国党校正规化，宋协娜进入济南市委党校校刊部从事编辑工作，参与了多个报刊的初创。改革开放之初急需培养大量领导人才，国内掀起了领导科学热，《领导科学报》也随之在济南市委党校诞生，宋协娜历经了初创和发展红火的阶段，编辑并出版《领导科学系列丛书》；组织多次全国性人才培训。机缘巧合，后来她又因工作需要调整至《党员干部之友》参与初创工作。在编辑岗位上，她本着讲政治讲党性讲责任的原则把关文章，每字斟句酌，精心编辑。她总是说，做任何事情，态度最重要。对于编辑而言，第一是认真，第二是认真，第三还是认真。认真的态度，奉献的精神，是为编辑之本。她的职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带动了身边的同事，慢慢地，大家都被她“影响”了，无需再强调，都自觉去执行。宋协娜曾获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编辑奖，她所在部门曾荣获山东省首届新闻出版奖优秀集体奖。

宋协娜曾挂职县委副书记分管信访工作。她认为问题源于现实，研究问题要面向实际，立足问题导向，注重“靶向研究”。她主动到现场接访，带领信访系统进行工作创新和试点工作，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她与信访局长期保持密切合作，以信访专家和信访事项“听证员”身份，积极参与信访工作实践；在党校教书育人和教学科研中，始终不忘发挥党校优势，以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形式近距离观察领导干部主体，深化对信访特性的研究，与党政领导干部教学相长、学学相长。

宋协娜积极投身学术活动的组织。作为省级学会的秘书长，10多年来参与组织了各类学术会议。每次会议，她定是最忘我、最投入的那个人。从会议议程、嘉宾行程、住宿安排到会场布置，事必躬亲，确保不出纰漏。作为教研部主任，宋协娜更看重青年人培养与团队建设。她主动了解青年教师的难处，与青年教师结成“忘年交”对子，不惜牺牲个人休息时间与青年人谈心，为青年人商讨职业规划，尤其是科研规划，甚至于文章选题、论文结构、项目申报都一一帮助青年人分析。

二

编辑是“杂家”。编辑工作必须拥有广博的学科储备，需要不断学习不同学科知识。尽管宋协娜最初所学的是政治学，但她长期涉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党建

设规律、社会学等，她认为学科之间都是相通的，同样的问题，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看，收获会不一样。做编辑就要做专家型编辑，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宋协娜始终强调做学问没有捷径，要靠付出，要“用最笨的功夫”“走最难走的路”“穷尽所有资料”，方可守得花开和月明。宋协娜对新知识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用她的话说，“新领域新知识刚接触时虽陌生，但边碰撞边学习，也就渐行渐进渐明，直至练达。学科都是相通的，殊途同归，万法归一”。她的工作生活圈既没有上下班的分别，也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办公室里、家里到处是书，不管到哪里去，包里也带着书。她还常说自己太笨，不写下来记不住，因此多年一直保持做着笔记的习惯，每年她都会记几大本。30多年来，一个个满满的笔记本，告诉了我们许多背后的秘密，记录了她不为人知的付出。

读书治学应有学术人格的自省。她说，人生要找到两个“知心爱人”，一个外在伴侣，一个内在伴侣。前者是同伴，后者是理想信念，具体则化为研究选题。她认为，真正的学者要将个人融入国家大义，我将无我，以大爱超越自我。社会责任、时代担当、家国情怀，应当永生相伴。于是，她追寻真善美，用一生去寻找这两个“爱人”，矢志不渝，潜心坚守。住校加班是她的家常便饭，在修改入选国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专著期间，她3个月没回家，每天连散步都免了，大家开玩笑说她就像长在了党校宿舍。那么，她潜心研究的关注点究竟是什么？是那些需要救助的人，特别是信访群众。通读宋协娜的成果，字里行间流露出满满的人文关怀，她主持过的3个国家课题都是关于民政、信访问题。她一直认为，国家长治久安，民生为本，党群关系最重要，自己作为党校人，就该倾力为党分忧、为民解难。

宋协娜对信访问题的研究，可追溯至1999年主持的国家项目。她从政府职能、管理与服务切入，重点关注社会良性运行与民政工作改革。她认为，研究信访问题，离不开党建研究。为此又专门做了党的执政能力研究的国家课题和两个党建项目，围绕党——政——民等主体良性互动这条主线来思考如何妥善解决社会问题。

她还以“信访问题统筹治理研究”立项国家项目，进而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宋协娜的所有研究，始终不离主体良性互动，终极目标是寻求完善人民群众基本权益的保障和实现。外人看来极其枯燥的学术研究，在她眼中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寒来暑往，乐享其中。多年的辛勤努力，宋协娜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国家课题皆以优秀结项，并入选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三

道不止，弘道之业亦不止。宋协娜认为，学问之奥妙，既在于提挈精髓，以为范式，又力求突破藩篱，求新图变。作为党校教师，就要恪守党校教师的职业道德，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作为学者，要严谨治学，躬行践履。她认为，学问之根本，其一要有切磋琢磨、不止不厌的工匠精神；其二要有针砭时弊、身系国家的责任意识。

宋协娜认为，博通与专精并不矛盾，交叉学科的思维更容易聚焦问题，开阔的思维更容易明了学术短板。她醉心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统筹学的研究，致力于厘清统筹学的研究原理、方法，力求提升统筹学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针对社会风险的复合性、潜在性、扩展性、结构性与制度性等特征，宋协娜提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蕴藏着深厚的统筹理论，要提升网络时代大数据格局下的治国理政能力，特别要注重统筹协调，用统筹思维加强国家网络空间治理，让网络成为党建、执政、强军、经济、文化、动员的新平台，以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社会问题瞬息万变，各种利益关系纠缠交织，不确定、不完整、不规则、测不准、不可控因素骤增，发展与矛盾共生、叠加，急需统筹平衡各方利益，凝聚改革共识。宋协娜认为，应对新时代的复杂性，要跳出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统筹学作为转变思维方式的方法论基础，是必须要研究的学问，是不能逾越的学术领域。她的学术理想是，为构建统筹学这一学科提供学理支撑，弘扬并创新统筹学这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在新时代发出耀眼光芒。

爱国情 奋斗者 党校人风采

（上接1版）

钟绍强在讲话中指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的重要节点，在西藏拉萨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西藏党校（行政学院）教研骨干培训班，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贯彻党中央新时代治藏方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重要举措。当前，党校（行政学院）要抓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头等大事，关键是要按照用学术讲政治的要求，培养和造就一批适应新时代党校（行政学院）事业发展要求的优秀教研骨干，培养和造就一批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

的知名教师。这次带到西藏的五门课，是为西藏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量身定制的。希望能充分发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业务指导作用，最大程度地延伸和拓展本次培训班的成果，帮助西藏地区党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熊刚毅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培训，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门针对西藏开展“送教上门”的首创之举，必将对全区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用学术讲政治深化教学改革，扎实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学研究工作起到强力的助推作用。

本期培训班学制3天。依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体班次的教学框架，培训班设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外交思想等5门课程，并安排了2次分组研讨和1次大会交流。秦刚、曹立、赵建军、郭强、官力等5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讲授相关专题并与学员进行了交流。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孙波参加了培训班相关教学活动。来自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的140名教研骨干参加了本期培训班学习。

（李娜）

《实践论》是毛泽东在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的讲稿，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文化为师承，以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为核心，通俗而又深刻地阐发了实践和认识的相互关系问题，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认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也为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树立了光辉典范。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就要向《实践论》学习，善于从哲学层面总结经验，提炼带有本质性、长期性、根本性的时代问题。1937年的毛泽东何以要研究和讲授哲学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根本目的是要解决中国革命碰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缺乏成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进程中曾经历了“两起两落”的曲折过程，即工农民主运动的兴起与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运动的兴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何以会跌跟头、犯错误、走弯路？这是摆在全党面前亟待解决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必须总结经验。然而有人却认为，革命遭遇挫折，“非战之罪，乃天亡我”，这是把革命失败简单归因于客观因素。对此，毛泽东分析指出，革命失败固然有敌我力量悬殊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党自身的原因，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主义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要赢得革命的胜利，就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然而，毛泽东又认为，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仅仅着眼于政治和军事等层面是不够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党何以在犯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之后，又连续三次犯了“左”倾错误？对此必须要从哲学高度加以反思。在认真研读哲学经典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其根源正是认识路线出了问题，即“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或者犯了“思想落后于实际”“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的右倾机会主义，或者犯了“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左”翼空谈主义或冒险主义。因此，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带有本质性、长期性、根本性的时代课题是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不断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也正因此，“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构成了《实践论》的核心主题。上述分析表明，从中国革命为何失败的实践之问，到机会主义何以源起的理论之问，再到知行关系如何统一的时代之问，《实践论》实现了现象性问题向本质性问题的转化，以哲学自觉深化了对时代课题的再认识。

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就要向《实践论》学习，善于用新眼光思考时代问题，提出思想创见并建构严谨的分析框架。主题明确之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前人留下和时代提出的问题置于思想史的语境和革命的历史时空之中，以独有的方式提出独具慧眼的新见并合乎逻辑地铺展开来。认识和实践即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对人类而言是极端重要且永远无法摆脱的普遍性问题。古今中外的哲人们既相互驳难又彼此启迪，在不断破解前人留下的理论困境的同时也为后来者开辟了新的思想生长点。通过深入思考和批判分析“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无论是传统中国围绕先后、难易、轻重等问题展开的思想辨析，还是传统欧洲流行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分析逻辑，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它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是错误的，因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离

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彻底批判了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坚持“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基于实践真正解决了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知行关系问题的重大贡献。然而，毛泽东又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沿着经典作家开辟的道路进一步考察“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对此，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谈话中曾明确指出：“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正因此，《实践论》的重点就是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向斯诺所介绍的“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他创造性地建构起了“三阶段两飞跃”的具体认识过程的分析框架，认为人的认识具体表现为基于实践的从感性认识阶段到理性认识阶段的第一次飞跃和从理性认识阶段回到实践阶段的第二次飞跃。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概括形成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总过程的分析逻辑，认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表明，从东西方思想传统的梳理分析，经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髓概括，再到认识过程分析框架的形成和展开，《实践论》提供了思考知行关系问题的新视角，清晰明确而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理论创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时代化和中国化。

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就要向《实践论》学习，善于在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展开思想观点的阐发和运用，形成独特的理论和语言风格。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既将知行关系的动态性学理阐述置于东西方思想史的深厚传统之中，通过比较分析既扬人之长又察人之短，实现了已有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在全面考察以往旧唯物论根本缺陷的基础之上，他精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认识论领域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在深入分析马克思、列宁以及中国传统思想家所留下的理论缺憾的基础上，毛泽东确立了认识过程的动态演进及其发展规律这一《实践论》的核心论点和相应的分析框架；又是在思想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传统的全面比较之中，毛泽东具体论证了认识过程中两次飞跃理论的合理性。《实践论》向世人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时代课题的哲学阐发，它是科学的历史哲学。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又将抽象的理论阐述融入中国革命的历史时空之中，在正面和反面、主观和客观、观点和方法的统一中把知行关系问题讲清、讲新了。《实践论》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和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分析，强调中国革命必须坚决反对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既要重视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致力于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更要注重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能动飞跃；《实践论》通篇贯穿着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基本要求，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在这“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承担着“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神圣使命，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实践论》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自觉地将认识

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实践第一与调查研究的统一，科学抽象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统一，理论向实践的飞跃与提出计划、方案、任务的统一，再实践、再认识与总结经验的统一，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反对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统一，如此等等。正因此，《实践论》是实践的革命的哲学。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还将思想逻辑的演绎置入中国人民的鲜活实践之中，用丰富的案例、生动的语言讲话了理论。他娴熟地运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中国典故、中国成语、中国风俗、中国经验等，通俗又极富新意地阐发思辨性的哲理，展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特点。例如“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历史典故，“让我想一想”“没有把握”的日常话语，尤其是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洞察，战争领导者对战争规律的把握，干部战士对工作内容 and 环境的掌握，新来者对延安的观察等认识案例，无不散发出浓烈的中国气息，凝聚着百姓的实践智慧，是从不同角度对知行关系问题的科学诠释。也正因此，《实践论》被公认为是大众的哲学、人民的哲学。

总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就要像《实践论》那样，善于在与传统的对话和时代的共振中总结提炼带有本质性、长期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善于通过和历史传统、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开阔新视野、提出新观点、建构新框架，善于用生动鲜活的中国经验、中国典故、中国成语、中国风俗深入浅出地阐释新理论，为今天这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不确定性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國思想。

向《实践论》学习用学术讲政治

□ 何建华